

以班雅明的書寫理念閱讀〈譯者使命〉中 「字」的旅行—以「傳達」為例

鄭惠芬

瓦特·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的〈譯者使命〉(“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是其生前少數發表的語言論述文章之一，也是當前翻譯理論研究經常引用的文章。其中，班雅明提出了許多看似平常的概念與字彙，然因刻意使用辯證式論證的方式，以及其神學、哲學、文學等多方的相互指涉的結果，使得這篇序言引發了不同的解讀，贏得了難解的名聲。

難解的原因之一，在於班雅明刻意為之的特殊用字手法及其論證式的論述邏輯。其中，「意象式思考」(*Bilddenken*) 對語言所產生的並列與辯證的張力，可謂其特殊用字手法的具體展現。本文即試以〈譯者〉中「傳達」(*mitteilen*) 一詞為例，並藉由其他相關文章的互文觀察，以據此重新檢視文中該字因此特殊手法所展現的無盡多義性。藉著這樣的梳理，筆者發現到，意象式的思考與書寫實踐的確為翻譯帶來很大的困難，這樣的困難亦使得語言的再譯與再詮釋產生了意義的流變。藉著「傳達」一詞的重新檢視，筆者亦試圖從該文的再譯與評論中檢視該字在其「後繼生命」(*Fortleben*) 中不斷旅行的軌跡，期能從中得到一些啟發，並為〈譯者〉解讀再多添一些可能。

關鍵詞：班雅明、溝通、傳達、語言哲學、翻譯理論

收件：2015年3月27日；修改：2015年5月27日；接受：2015年6月26日

Walter Benjamin's Writing Style – Re-observing the Traveling Words in Benjamin's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Hui-Fen Cheng

Walter Benjamin's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is one of his most important published articles. Although it was published as an attached preface to his translation of Charles Baudelaire's poetry, "*Tableaux parisiens*",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not primarily to offer ideas on practical translation issues, but to account for his continuous and consistent concerns wit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philosophical questions. Yet Benjamin's unique style in his writings, perhaps more poetic and philosophical than scientific or pragmatic, makes them seem enigmatic. Thus inevitably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his essays, including this one. Although to fully understand this essay may be an impossible task, it will surely help to look more closely at his writing process here.

This article thus looks at similar writing phenomena in Benjamin's other texts that bear the same concerns with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 primary focus will be on the *Bilddenken* ("picture thinking") – the constant and repeated use of a word root in forming verbs, nouns, adjectives, etc. in order to unravel a concept. One of the most concrete examples of his habitual writerly practice, this tendency or idiosyncrasy gives his writing a foreign sense even to German readers reading them in the original German. Thus obviously Benjamin's essays will be difficult for readers from any linguistic background, even if reading them in translation, and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will likely be struggling with the possibilities of translatability.

Using the verb "*mitteilen*" (to inform, to tell something) as a concrete example, and also with the help of intertextual readings in Benjamin's other linguistic-philosophical works, this article seeks to look once again at the method of *Bilddenken* employed in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with the goal of facing these difficulties that the translators nowadays are still facing.

Keywords: Walter Benjamin, communicate, *mitteilen*, language philosophy, translation theory

Received: March 27, 2015; Revised: May 27, 2015; Accepted: June 26, 2015

Hui-Fen Cheng,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evelinechengst@gmail.com

壹、前言

〈譯者的使命〉(“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以下簡稱〈譯者〉) 是瓦特·班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 1892-1940)在翻譯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巴黎風光〉(*Tableaux parisiens*)時所同時發表的序言，是班雅明有生之年得以出版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也是今日在文化研究的討論中經常被引用的文章。該文早於1923年發表，但因其非主流的譯法，使得該譯本在出版時並未獲得廣大的迴響。而這篇附屬的序言雖然在後世引起了廣大的迴響，但由於文章中濃厚的神秘與哲學指涉及特殊的思考邏輯與書寫方式，使得這篇文章至今仍讓人有難解的印象，也因此引發各種不同的詮釋。

〈譯者〉引起翻譯學界，特別是使用英語的學界廣泛地引用與討論，主要是由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1968年主編的《啟迪》(*Illuminations*)所影響(Schöttker & Wizisla, 2006, p. 42)。《啟迪》中所收錄班雅明的文章，主要是由哈利·宗恩(Harry Zohn)翻譯成英文。該文集列入翻譯經典文集之後，對其後翻譯研究領域的討論更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但其英譯文的廣大影響有時卻取代了原文，因而造成了更多元的解讀。透過中譯本的觀察，筆者發現，許多的中譯本亦因為英文版《啟迪》的經典地位，而多以此英譯本作為中譯的底本。因此，宗恩的英譯對於中譯的影響無形中亦佔了相當重要的位置。除此之外，德希達(Jacques Derrida)透過其文章〈巴別塔〉(“Des Tours de Babel”)以解構的觀點重新詮釋班雅明的語言哲學，以及保羅·德曼(Paul de Man)於1983年在康乃爾大學的演講〈結論：瓦爾特·班雅明的〈翻譯者的任務〉〉¹亦在中文語境下的班雅明評論中佔有重要的位置。這幾篇評論班雅明的重要文章無形中也因為有中、英文譯本，對中文閱讀環境下的讀者影響甚深，相對的也影響其對班雅明的詮釋。

¹ 英文題為“Conclusions: on 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Messenger Lecture, Cornell University, March 4, 1983。本文中文標題採用陳永國(2004)譯本。

然而，觀諸班雅明在 1924 年以前以學術論述為主的諸多文章，語言哲學與文學批評一直是他論述的主要關懷。如其一生的摯友格雄·碩勒姆 (Gershom Scholem) 所說，〈譯者〉這篇文章是「班雅明在語言哲學裡公開研究神學的階段高潮」（朱劉華，2009，頁 124）。雖然，今日我們得以透過後世的人所編纂的各種班雅明文集而得以發現到，他在諸多論述中有許多同樣的語言哲學語彙及論述方式，但在其生前，他的學術與出版歷程是相當坎坷的，可以說除了〈譯者〉之外，他想要在大學教書而從事的各種學術論述均沒有獲得任何出版的機會。因此，在班雅明於學術生涯的努力毫無所獲之際，此時的班雅明亦嘗試以譯者的身分發表文章。也因此，我們在這樣的時間點，可以看到班雅明對其長久以來在語言哲學與文學批評的看法上想要一展其看法的野心，也可以看出他試圖將譯者置放於歷史哲學高度的意圖。

德文版《班雅明全集》(*Gesammelte Schrift*) 的編輯之一 Rolf Tiedemann (1999) 即特別指出，班雅明在〈譯者〉中所著重的是理論的發展，並藉著翻譯外國語言的這種重新撰寫的行為，探討如何開拓現有德語界線的問題。其中，班雅明在論述中強調的“*Wörtlichkeit*”，是一種彌賽亞式的語言形上學 (*einer messianischen Metaphysik der Sprache*) (Tiedemann, 1999, p. 431)。Sigrid Weigel (2008) 亦指出，〈譯者〉的重點不在討論何為好或壞的翻譯，而是討論可譯性作為一種形式的問題；藉此探討，反思的空間得以擴展，以越過語言因落入傳達 (*Mitteilung*)、意涵 (*Sinn*)、意圖 (*Intention*) 等等類別所設的藩籬 (p. 215)。由上述幾個重要的班雅明評論看來，“*Wörtlichkeit*” 一字看似平常所指的「逐字翻譯」，但若就班雅明的哲學興趣以及其書寫的目的看來，此字應有更深遠的意涵，而這樣的意涵亦層層與其他我們看來似為理所當然的許多語言相關字詞，如傳達 (*mitteilen*)、表達 (*ausdrücken*)、媒介 (*Medium*) 等等環環相扣，形成它們獨特的一套班雅明專用的哲學語彙 (*Topoi*) (Menninghaus, 1995, p. 8)，而我們在閱讀班雅明文中這些看似平常的字眼時，如 *Name*、*Medium*、*Mitteilung*、*Offenbarung* 等，每個字都需要重新思考 (Menninghaus, 1995, pp. 20-21)。

本文僅從〈譯者〉一文具有傳遞訊息與溝通²意涵的傳達 (*mitteilen*) 一詞作為觀察對象，並針對該字所衍生的相關字彙，從班雅明的另外兩篇相關的語言哲學著作〈論語言之究竟及論人的語言〉(“Über Sprache überhaupt und über die Sprache des Menschen”) (以下簡稱〈論語言〉) 及《德國悲悼劇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 (以下簡稱《悲悼劇》) 做互文的觀察，並從班雅明的書寫手法與書寫意圖予以相互印證，期望能夠更深入地了解班雅明對這個字所賦予的辯證意涵，並期望能夠在諸多先進努力嘗試的各種譯本與所產生的詮釋之間再多添一點互補的可能。

貳、班雅明的書寫手法與意圖

阿多諾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9) 在〈瓦特·班雅明的個性〉(“Charakteristik Walter Benjamins”) 一文中指出，在班雅明筆下，他的用字 (Worte) 不斷演變，形成一種放射狀 (*radioaktive*)。這種能力使得文字產生源源不絕的新意義。與其說是要來打破傳統，班雅明所擁有的這種能力更像是一種源自自身內在的一種認知機制，而傳統對之使不上任何作用 (Adorno, 2005, p. 155)。

阿多諾提到的這種特殊的用字手法，其實是班雅明在其學術研究階段即已開始形成的一種「哲學式書寫」，其目的在於能夠重新建立一種新的書寫文體，使之能夠重新思考哲學討論中經驗、理念、歷史、與語言表達之間的關係。其作為謀取教授職但卻遭到婉拒的資格論文《悲悼劇》即為最鮮活的例子。1925年 Hans Cornelius 的評語說明了婉拒的理由：“The work of Dr. Benjamin...is excessively difficult to read. A lot of

² 〈譯者〉一文已有許多英譯與中譯版本。其中針對“*mitteilen*”一詞，胡功澤在〈班雅明《譯者天職》中文譯文比較研究〉一文中已針對多處重要的地方，以其德譯中版本相對應於其他四個英譯中版本加以比對分析，並列舉出兩種英文版本以為對照。其中有英文譯本將“*mitteilen*”一詞翻譯為“communicate”。詳見胡功澤 (2009)。

words are used whose sense the author does not feel obliged to explain.”³ 班雅明予當代學者的印象是，他身為作者，卻覺得沒有清楚定義這些字的責任，導致許多字彙難以理解。但對於班雅明而言，這種前衛的分析思考 (avant-garde style of analytical thinking)，以並列 (constellation) 而非定義的方式逐步進行論述正是他書寫最重要的方式，目的即欲挑戰既存於德國大學人文體系中的認知與批評系統 (Finkelde, 2009, p. 47)。Gary Smith 亦論及班雅明在《悲悼劇》中想要賦予其語言哲學理論一種「具體的文學—歷史形式」(concrete literary-historical form) 的企圖，而這樣的獨有的書寫形式亦存在於其當時以批判認識論為主軸的各式書寫之中，其中包括〈譯者〉與〈歌德的選擇親和力〉(Goethes Wahlverwandtschaften)，也影響著其後來的各種寫作 (1989, p. xii)。

在《悲悼劇》中，班雅明即認為，哲學的論述應該具有一種「思索式的表達」(*die kontemplative Darstellung*)，其目的不在於激發讀者的熱情，而應以「清醒」(*Nüchternheit*) 的散文風格與距離迫使讀者停下來思考，因此這種寫作必須一字一句重新書寫，而「理念」(*Ideen*) 便是這種書寫的主要關懷 (Benjamin, 1991c, p. 209) 因此，理念的覆述與整理是班雅明哲學思考的重要主題，而其書寫模式是自覺且清醒的，其目的即在於讓讀者跳脫渾噩的現實與操作，能夠為自身所處的生存空間進行思辨。在這樣有意識的哲學書寫之中，班雅明在《悲悼劇》文中使用「教義字」(*Lehrwort*) 這個字眼作為理念推演的基本單元。某些乘載理念的重點「字」的重複使用與反覆辯證方法，即在班雅明的書寫中形成了如 Niranjana (1992) 所說的一種比喻或轉義系統 (troping)：

A constant troping, we have been seen, is characteristic of Benjamin's work. The tropes reappear again and again in his writings, as if his

³ 本文摘自 Dominik Finkelde 的英譯 (Finkelde, 2009, p. 46)。其原文出自 *Frankfurter Schule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Linguistik* 14(1984): 147-65. “Die Arbeit des Herrn Dr. Benjamin ... ist überaus schwer zu lesen. Es werden eine Menge Wörter verwendet, deren Sinn zu erläutern der Verfasser nicht für erforderlich hält.”

changing political-theoretical concerns continually clustered around his favorite motifs and drew the strength of their articulation from the obsessive, repetitive nature of his style. (Niranjana, 1992, p. 117)

因此，在《悲悼劇》中，「字」便具有其哲學的任務：哲學的工作就是要把已經被向外設定用來傳遞訊息 (*nachaußen gerichteten Mitteilung*)，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每個字，重新置放在其最原初的位置 (Benjamin, 1991c, pp. 216-217)。因此，班雅明的書寫，意在突破被象徵與寓言重重困住的限制，使思考回到更原始的、更具創造性的原初，而首要工作便是從我們使用的每一個字詞著手。如漢娜·鄂蘭所言，班雅明對每個字所採的態度猶如在深海採珠，是一種鑽探法 (Arendt, 2006, p. 94)，亦如班雅明本身意識到的，他是把德文字當外國字來使用 (Benjamin, 1991f, p. 418)。

然而，班雅明的做法並不是去創造新的字詞，而是藉著凸顯一個字的某個部分，如字尾 (suffix, *Nachsilbe*) (Weber, 2008, p. 75)，使得該字看起來似乎很熟悉，但其實已經是一種造字 (*Wortschöpfung*) (Weigel, 2008, p. 215)。由此，我們可以略窺班雅明的書寫何以令人難解，因為看似平常的每個字，藉著詞性的改變，乃至置換了字首或字尾，又甚至是同一個字反覆置放在不同的脈絡，乃至以不斷並置與辯證式的反覆論述方式，都會讓閱讀變得緩慢而讓人必須不斷地停下來思考，而這亦正是班雅明在《悲悼劇》的〈認識論批判序言〉中提出研究哲學唯一適合的書寫方式，即不斷重新呼吸式的、思辨式的描述 (*kontemplative Darstellung*) (Benjamin, 1991c, p. 207)。

這種特殊的用字法即 Sigrid Weigel 與阿多諾等人所特別強調的，為班雅明書寫中的一種特殊手法——「意象思考」(*Bilddenken*)。班雅明曾在學術生涯的追求失敗之後，在各地旅遊的歷程中，以片段式的書寫方式記錄下種種心靈意象。《班雅明全集》中即以〈思想意象〉(*Denkbilder*) 為題，將之收錄於第四冊 (Benjamin, 1991d, pp. 305-438)。據編者 Tillman

Rexroth 的說明，班雅明這種獨有的寫作手法是一種哲學形式，隱藏在對著看似不起眼的物件做遊戲式思考的面具之下 (1991, p. 883)。阿多諾在評論班雅明的《單行道》(*Einbahn Straße*) 時便提到，班雅明的《單行道》是一部「思維圖像集」，然而在他的筆下，這個詞彙的意蘊是被改變了的：

因為抽象思維正在自己的傳統概念形象裡發呆，想像似乎拘謹而且過時。在通常的風格裡不用加以證實並能戰勝的事物，應該推動思維的自發性和能量，雖然不一定要逐字逐句地被人接受，但卻應該通過一種知識分子的短路方式，激發出突然照亮周圍所熟悉事物的火星，如果不使它們燃燒起來的話。(李士勛，2000，頁 114-115)

在《單行道》裡面，有一句話或許可以做為這種看似遊戲、實則是一種「短路方式」的最佳例子：“Für Männer, Überzeugen ist unfruchtbar” (Benjamin, 1991e, p. 87)。其中“überzeugen”一詞普遍看起來是「說服」的意涵，但若將該字拆解為 über-zeugen 兩個部分，則可以解讀為「過度—生產」，其意涵可以是生產了過多的子嗣，也可以是指工具化的複製經濟之過度製造。Unfruchtbar 一詞，可以理解為「沒有結果的」，但若拆解其中的字根為 un-frucht-bar，中文大致對應為「無—果—可能的」，同樣可以從不同角度來使之產生不同的意義。在這短短的一句話中，讀者不得不停下來思考，這其中指涉的是「男人不會聽勸的」，或是「對人類來說，生再多也沒用。」又抑或是「對人而言，機械複製終究不會帶來好的結果。」班雅明如此的書寫，便是希望將所有的意涵並列在字詞之中，然而這對翻譯便帶來極大的困難。Weigel (2008) 在其專書中即將班雅明的這種特殊寫作手法稱之為「意象思考」(*Bilddenken*)。他指出，班雅明的意象思考，是一種將語言並列 (*sprachliche Konstellation*) 的刻意模式，藉此使他的語言能夠與既有概念與隱喻產生對立關係，使得思考因

為各種並列所產生的張力而靜默，由此以產生一種辯證意象 (p. 214)。然而，在英文翻譯中，這種使語言並列的手法經常會被忽略。Weigel 在文章中亦以上列《單行道》的短句為例，指出英譯⁴ “To convince is to conquer without conception” 的譯法，將原本班雅明警語式的哲學暗示變成了性的雙關遊戲 (sexuelle Anspielung) (Weigel, 2008, p. 225)。

Weigel 所指的意象式思考或許更多是指班雅明較後期，即由學術論述轉向文學評論之後的書寫實踐之中，但藉由 Weigel 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到其所舉的意象式思考亦已大量地潛伏在班雅明各個時期的書寫之中。如〈論語言〉中 *un-mittel-bar* (直接性) 與 *mittel-bar-keit* (間接性)、〈譯者〉中提到的 *mit-teilen* (傳達、告知)、*Über-leben* (餘生)、*Wört-lich-keit* (逐字)、*Er-kennen* (認識)，在拆解字根以及班雅明將之以邏輯論證的手法不斷地反覆拆解使用之下，我們不得不認真地思考班雅明在這種特殊的、刻意為之的用字手法之下，在其論述中每個字詞所欲傳達的哲學意涵與思欲突破傳統的辯證邏輯。

參、從〈論語言〉的互文性看〈譯者〉中的傳達

從上述的各種評論，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以一種獨有的文學形式作為其突破現有語言藩籬的語言哲學，似乎是班雅明在各種學術與文學批評的書寫中重要的關懷之一。而其中，「字」(*Wort*) 更肩負著這樣的哲學任務。從〈譯者〉中我們即可以循著這樣的書寫方式，發現 *mitteilen*、*Mitteilung*、*vermitteln* 等辭彙與一般我們所理解的「傳遞訊息」、「傳達」等意涵開始產生了距離，但又以更多義的方式在新舊看法之間反覆辯證。胡功澤 (2009) 在〈班雅明《譯者天職》中文譯文比較研究〉中即已注意到這一點，他指出，這些詞彙「在文本裡有重要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是關鍵辭彙」(頁 217)。

⁴ 此處英譯指由 Edmund Jephcott、Kingsley Sorter 所翻譯的 *One-Way-Street and Other Writing*, London, New York: 1979, 引自 (Weigel, 2008)。

Stéphane Moses (1989) 即指出，班雅明在〈譯者〉中認為溝通的工具性是語言墮落的原因，翻譯的烏托邦存在於語言最原初的創造力，及其「神力」(magic) (p. 240)。這樣的觀點或許可以從班雅明於 1916 年即已撰寫的〈論語言〉作互文之觀察。〈論語言〉一文在班雅明有生之年未曾發表，是他與好友碩勒姆在密切討論語言、哲學、與宗教的求學時期，針對碩勒姆的問題所作的回應。從這篇較早的語言哲學文章來看，我們更能夠看出「傳達」(*Mitteilung*) 一詞在班雅明各篇語言哲學的論述之中所共同構築的更深層的意涵。

在〈論語言〉中，傳達 (*mitteilen*) 一字即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語言原初本是精神存在的直接傳達，可以是人自身的傳達 (*Mitteilung*)，其可傳達者是直接、無中介的 (*unmittelbar*)、創造的 (*schaffend*)。在人的墮落及人類字的誕生之後，人類的語言走出純粹的名稱語言，語言成了一種工具 (*Mittel*)，一種單純的符號 (*Zeichen*)，而這樣的結果又導致了語言的多元性。在墮落的過程中，人離開了具體事物在傳達時的直接性，「從而墜入了一切傳達都只是間接 (*Mittelbarkeit*) 傳達的深淵；字成為工具之深淵、空洞的深淵、空談的深淵」(Benjamin, 1991b, p. 141)。班雅明反覆要闡述的概念是，每一種人類的精神生命 (*Geistesleben*) 的表述 (*Äußerung*) 都可以理解為一種語言，因此，語言是一種表現，所表現的是精神生命。但如何將這種表現做出理解與詮釋，則實際的形式會使得理解與詮釋的過程中產生新的變化。在班雅明的這篇語言理論中，各種精神內容 (*geistige Inhalte*) 的傳達 (*Mitteilung*) 均為語言，透過言詞 (*Wort*) 的傳達僅是其中一種特殊的，以人類為基礎的特例。

班雅明亦在這篇文章的開頭即試圖想要釐清當時流行的語言觀點。他說：「語言與精神本質，即語言與其所欲傳達的部分，好似不言而喻是不同的、分開的兩方。這樣的假說即是威脅語言理論墮落的原因。因此，將這樣的理論懸置，正是語言理論應當從事的任務 (*Aufgabe*)。」語言傳達了甚麼？其答案則為：每個語言傳達其自身。“*Jede Sprache teilt sich selbst mit.*” 這句話看似一種同義贅述 (*tautologie*)，實則表示：凡在精神本

質中可以傳達者，即是其語言，所謂「可傳達者」(*Mittelbare*) 便直接是語言本身：

每種語言在自身中傳達其自身 (*teilt sich in sich selbst mit*)，以最單純的意涵來說，每種語言是傳達的「媒介」(*Medium der Mitteilung*)。這個中介質 (*Mediale*)，即所有精神傳達的直接性 (*Unmittelbarkeit aller geistigen Mitteilung*)，即為語言理論的基本問題，而若人們將這種直接性稱之為神奇 (*Magie*)，則語言的原初問題即為其神力。而神力這個字用在語言中，更有另一層意思：即其無限性。(Benjamin, 1991b, pp. 142-143) (本段由筆者自譯)

在〈論語言〉中，我們也看到班雅明對「翻譯」的描述：唯有透過翻譯，物的語言才能進入到認識的語言與名稱的語言之中。翻譯成為人的語言不僅是將無聲翻譯成有聲，也是將無名翻譯成有名。班雅明在這篇文章之中，將翻譯提升到「語言學理論最深刻的層次之上」來予以呈現與討論。翻譯要解決的並非語言與語言之間的訊息傳達或對等，而是試圖以人的認識，在有名之間尋求對無聲萬物之表達。因為精神本質「在」語言中傳達其自身，所以，語言具有無限性，因此，在尋求表達的過程之中，語言本具有創造性，是一種持續的變化。(Benjamin, 1991b, p. 151)

從〈論語言〉之中，我們即可看見字詞在班雅明論述中是如何自由地流動、拆解、並重新建構於他的論述邏輯之中。班雅明開宗明義已賦予「傳達」(*mitteilen*)、「媒介」(*Medium*)等詞彙形上學的層次與意涵，而直接性 (*Unmittelbarkeit*) 若拆解為 *Un-mittel-bar-keit*，其中的 *Mittel* 一詞亦可解讀為「工具」，使得「間接性」(*Mittelbarkeit*) 不但與「直接性」相互呼應，班雅明對工具性的批判亦同時並列在字詞之間。Weigel 所提出的「意象式思考」已存在於這篇早期的論述之中，並以相當大量的造字模式進行哲學式的論證。

藉著這樣的觀察，我們再來看〈譯者〉，即可以發現到同樣的造字模式與辯證的論述邏輯，並可在兩篇文章之中找到互文與論述的連貫性。為了凸顯班雅明的「意象思考」，筆者對於中譯無法解決的部分，選擇以德文原文與中文並列的方式呈現，以強調每個字的變形過程。括弧中的中文部分為筆者參考各譯本自行翻譯，目的僅供對應原文時方便對照。但為了顧及文句的可理解度，中譯文尚無法使每個重複的字或字根以同一個中文對應之。因此，筆者刻意以粗體與底線在中文與德文處標示出相對應的部分，以便提醒讀者該處是一個重複的意象。然而翻譯終究是一種詮釋的結果，筆者選擇以自己的詮釋與理解做暫時性的翻譯，而不選擇其他中譯本，主要在能夠讓讀者對譯本產生距離感，而非直接以譯本當作原本內容來閱讀。

在〈譯者〉一開始的第二段，班雅明即指出本質與傳達的問題：

Was, sagt‘ denn eine Dichtung? Was **teilt** sie **mit**? Sehr wenig dem, der sie versteht. Ihr Wesentliches ist nicht **Mitteilung**, nicht Aussage. (Benjamin, 1991a, p. 9)

（一個文學作品到底「說」些什麼？它要**傳遞**給我們什麼？對於理解的人來說，要**傳達**的很少。文學重要的不在**傳達**，不在說出來。）（由筆者自行翻譯）

文學作品究竟功能何在，是傳遞訊息？抑或者是其他的。若我們以小說為例，或許稍微可以理解。小說中要傳達給我們的究竟是故事劇情，還是時代的氛圍，又抑或者是連作者自己都無法說清楚的神祕或心靈感受？若我們無法回答清楚，那麼，班雅明似乎也沒有要給明確答案的意圖。班雅明在這裡從作者意圖的角度切入，以質疑一般認為譯文理所當然應該要具備的傳達原文訊息的功能，那麼身為譯者又該如何對待所謂的原文 (*Original*) 呢？班雅明在這篇文章中並沒有如其他語言理論，以大量的篇幅闡釋有關理念 (*Idee*) 與表達 (*Ausdruck*) 之間的關係，而是以

此為前題，直接進入譯者在這兩者之間的張力與關係。

Dennoch könnte diejenige Übersetzung, welche **vermitteln** will, nichts **vermitteln** als die **Mitteilung**- also Unwesentliches. Das ist denn auch ein Erkennungszeichen der schlechten Übersetzungen. Was aber außer der **Mitteilung** in einer Dichtung steht - und auch der schlechte Übersetzer gibt zu, daß es das Wesentliche ist- gilt es nicht allgemein als das Unfaßbare, Geheimnisvolle, 'Dichterische'? (Benjamin, 1991a, p. 9)

（那麼，想要**傳遞訊息**的翻譯，除了**訊息**，也就是不重要的部分以外，沒有**傳遞**其他的東西。這也是不好的翻譯的特徵。而在文學中，除了**訊息**之外的東西——即使不好的譯者也承認，——不都是那些無法捉摸、神秘莫測、「詩意」的部分，才是重要的部分嗎？）（由筆者自行翻譯）

我們必須牢記在文章開頭的這段所提到的文學中重要與不重要的部分，才能接續理解他定義所謂不好的翻譯，是「不精確地**傳達**不重要的內容」（*als eine ungenaue Übermittlung eines unwesentlichen Inhalts*），且「汲汲於為讀者服務」。翻譯與原文之間，除了內容的傳達，還有其他的關係。

翻譯是一種形式。將翻譯視為如此去理解，也適用在對原文的理解上。因為在原文中，其法則即為**可譯性**（*Übersetzbarkeit*）。（Benjamin, 1991a, p. 9）（由筆者自行翻譯）

可譯性是甚麼，班雅明將討論拉回到理念、概念、與表達之間的關係。「相對於原文，必須指出的是，某些關係概念保留了好的，或許是最好的意涵，如果不是從一開始就僅限於人。」生命的本質（*Wesen*）⁵

⁵ 本質（*Wesen*）這個字，在班雅明的行文中亦佔了相當重要的位置。前面提到「文學重要的不在傳達，不在說出來」的德文即為“*Ihr Wesentliches ist nicht Mitteilung, nicht Aussage.*”。*wesentlich* 一詞不但可解釋為「重要的」，亦是「本質核心的部分」。本文因為篇幅的關係，僅將重心放在「傳達」的部分，因此翻譯無法顧及這個部分，僅在此提出提醒。

不一定能夠由人來達到表達的要求，但卻是人類語言不斷可以繼續努力的方向。因此，對人來說是尚且無法翻譯者，該語言組成的可譯性 (*Übersetzbarkeit*) 仍然存在。而如果翻譯是一種形式，那麼可譯性對某些作品來說便是其本質 (Benjamin, 1991a, p. 10)。

與〈論語言〉相同的是，在〈譯者〉中，班雅明也希望將語言的表達提升到人類目前無法達到的層次，而透過世世代代的翻譯，翻譯對原文中的可譯性不斷嘗試，作品也因此得到了其不斷隨著歷史生命開展的續命 (*Fortleben*)：

因此，哲學家的任務是從更廣大的歷史生命來瞭解所有的自然生命。……翻譯 (*Übersetzungen*) ——當其不僅只是傳遞訊息 (*die mehr als Vermittlungen sind*) ——便由此產生，當一部作品在其後繼生命 (*Fortleben*) 中達到他的聲譽，這種翻譯不是服務讀者——猶如不好的譯者認為那是他們的工作並亟力的維護著那般，也不將其存在歸功於原著。在翻譯裡面，原文達到其不斷更新之後的最新、最全面的發展。(Benjamin, 1991a, p. 11) (由筆者自行翻譯)

我們由此已約略可以看出，班雅明所討論的傳達 (*Mitteilung*)，是生命本質與物之精神內容如何透過語言形式表達出來的形上學問題。而他要提出質疑的，是一般的翻譯理論以訊息傳遞作為任務前提的正當性。「那些理論到最後還是無法說出，對翻譯來說真正本質與重要之處」(Benjamin, 1991a, p. 12)。

與〈論語言〉中對語言在自身中傳達自身的這種無限性相對應的，是〈譯者〉中提出的，對一般翻譯理論只重訊息傳達，將語言視為工具的論點的批判。一般的翻譯理論，討論的總是忠實與自由這兩個面向——自由地再現意涵 (*sinngemäßen Wiedergabe*)，以及逐字的忠實 (*Treue gegen das Wort*)。在這兩者之間，班雅明同樣將語意的再現 (*Sinnwiedergabe*) 與訊息傳達 (*Mitteilung*) 置於自由與忠實的層面來予以討論。筆者一直要提醒

讀者不能忘記的是，回到〈譯者〉最前面的論述，班雅明已將語意的再現與訊息傳達放置在他所欲批評的一般翻譯概念的層面上，是文學中不重要的部分。換句話說，我們若僅追尋原文的語意再現與訊息傳遞，會將原文視為是已經不可改變的一個客體，也會將自己的語言視為是另外一個工具，是分開的兩方，而僅能追求彼此間抽象的對等或侷限於相似度的範疇，如此，則翻譯會陷入隱喻與寓言的束縛之中，無法跳脫。在這裡筆者要同時強調另外一個與傳遞訊息具有密切關連的字，即語意 (*Sinn*)。這個字雖然也經常被翻譯為「意義」，但在此處班雅明很明顯地將之置放在一般訊息傳達的層次，與另一個同樣經常用來表示「意義」的字 (*Bedeutung*) 有所不同，在這篇文章中，語意的再現 (*Wiedergabe des Sinnes*) 與生命本質尋求其意義的描述 (*Darstellung seiner Bedeutung*) 是不同的層次 (Benjamin, 1991a, p. 12)。以這樣的脈絡作為前提，我們閱讀以下幾段翻譯經常討論並引述的段落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

Denn was kann gerade die Treue für die **Wiedergabe des Sinnes** eigentlich leisten? Treue in der Übersetzung des einzelnen Wortes kann fast nie den **Sinn** voll **wiedergeben**, den es im Original hat. Denn dieser erschöpft sich nach seiner dichterischen **Bedeutung** fürs Original nicht in dem Gemeinten, sondern gewinnt diese gerade dadurch, wie **das Gemeinte** an die **Art des Meinens** in dem bestimmten Worte gebunden ist. Man pflegt dies in der Formel auszudrücken, daß die Worte einen Gefühlston mit sich führen. Gar die **Wörtlichkeit** hinsichtlich der Syntax wirft jede **Sinneswiedergabe** vollends über den Haufen und droht geradenwegs ins Unverständliche zu führen. (Benjamin, 1991a, p. 17)

(那麼忠實這個概念到底能為**語意再現**做些甚麼？翻譯的時候對個別字詞的忠實，幾乎從來不曾把原文裡的**語意完全再現**。因

為，在這樣的原文裡的文學意義，不在於所指，而在於如何透過指意方式，藉著某些字詞的組合，將所指表現出來。在這樣的形態下，人們只追求字詞必須帶有某種情調。而這樣的跟隨原文句法的字對字的翻譯，使語意再現的可能成為泡影，甚至直接導致無可理解的危險。）（本段由筆者自行翻譯）

因此，班雅明的結語是，要求一般翻譯理論中所謂字對字的忠實終究無法達成保留語意 (*der Erhaltung des Sinnes*) 的要求。若要保留原文語意，那種所謂不好的翻譯，毫無節制的自由翻譯，會好得多，當然，越這樣做，對於文學作品以及語言更無助益。而這樣的結論也呼應到筆者上一段一再強調的，即班雅明開頭所欲拉開的層次問題。以這個前提，我們才能更仔細地觀察班雅明這段經常被引述的，關於「碎片」的段落：

更要緊的是，對於翻譯的要求，其道理看似近在眼前，但其理由實則深藏不露，必須從更令人信服的脈絡來解釋。就好像一個容器的碎片，為了黏接起來，彼此之間連最小的地方也不放過。但碎片本身的形狀不須相同，翻譯也是一樣，不是去相似於原文的語意 (*Sinn des Originals*)，而是要充滿熱忱地，用自己的意旨方式不放過任何細節地去建構，讓人可以認出二者均為同一個容器的碎片，為一個更大的語言的碎片。正因為如此，翻譯需要在較高的程度上離開想要傳達甚麼訊息 (*etwas mitzuteilen*)，甚麼語意 (*Sinn*) 的意圖；原文對於翻譯之所以重要 (*wesentlich*)，在於它為譯者以及翻譯除去了必須傳遞訊息的功夫與規定 (*Mühe und Ordnung des Mitzuteilenden*)。⁶ (Benjamin, 1991a, p. 18)

⁶ 本段仍由筆者自譯。但讀者或許可以自行對照其他中英譯文。其中宗恩在這段的翻譯已有多處被其他學者提出批評，以致他在1996年重新翻譯後對此段重要的詞彙有所修正。而此舉亦導致諸多譯本與解讀產生各種出入的現象，與筆者所譯也有很大的不同。詳細的比對或可參照胡功澤〈班雅明《譯者天職》中文譯文比較研究〉。筆者於此暫不贅述。

由於忠實與自由這樣的二元辯論所討論的，畢竟總是離不開緊扣原文層次的語意再現與訊息傳遞，因此總是陷入無解的爭論之中。班雅明要追求的，是跳脫文本的暫時性與侷限，讓語言因翻譯的活動能夠回到更具有無限性與創造性的原初的語言。因此，他在上段文章中也說明，「必須從更令人信服的脈絡 (*Zusammenhang*) 來解釋」。而其脈絡便是神學、形上學的：

Auch im Bereiche der Übersetzung gilt: *Εν αρχή ην ὁ Λόγος*, im Anfang war das **Wort**. Dagegen kann, ja muß dem **Sinn** gegenüber ihre Sprache sich gehen lassen, um nicht dessen **intentio** als **Wiedergabe**, sondern als Harmonie, als Ergänzung zur Sprache, in der diese sich **mitteilt**, ihre eigene Art der **intentio** ertönen zu lassen. (Benjamin, 1991a, p. 18)

(即使在翻譯的領域中，亦適用 *Εν αρχή ην ὁ Λόγος*，「太初有言」這句話，如此，相對於語意，翻譯便能夠且必須讓其語言走自己的路，使其不必以語意的再現為其意向，而是以讓語言和諧，以讓語言互補為其目標，讓語言傳達其自身，讓意向依其自身的方式表達出來。)(本段由筆者自行翻譯)

所謂的傳達，至此有了更深層的意涵，也同時呼應了〈論語言〉中「語言傳達其自身」的概念及《悲悼劇》中對「字詞」(*Wort*)的要求：透過表達 (*Darstellung*)，讓字詞再回到原初的位置 (Benjamin, 1991c, pp. 216-217)。追求訊息的傳遞與追求語意的再現無法碰觸到的，是「那個突破或強大地跨越所有傳達，最終的、具有決定性的部分」。因此，突破與創造，才是翻譯所要真正從事的：在所有語言以及其文字之內，除了可傳達 (*Mittelbare*) 的，還有一個無法傳達 (*Nicht-Mittelbares*) 的部分，而在語言的生成 (*Werden*) 過程中表達自身，尋求創造，這便是純語言的核心 (*Kern*)。而當這個核心被困在語言的結構之中，被加諸沉重的與陌

生的語意 (*Sinn*)，將這一切束縛鬆開，將象徵者還原到被象徵者，在語言的運動中找回純語言，唯獨翻譯具有此強大且唯一的能力 (Benjamin, 1991a, p. 19)。

肆、淺談〈譯者〉的翻譯問題

從上述緊扣著「傳達」一字的閱讀方式來看班雅明的〈譯者〉之後，我們益發可以察覺，班雅明在〈譯者〉中所展現的獨特辯證風格與其論述中邏輯與脈絡的重要性。每一句的邏輯彼此環環相扣，難以從中斷章取義。藉著不斷的反問句式，班雅明亦讓我們驚覺訊息傳遞與詩意表達之間是有距離的，筆者以為，班雅明的破題句式與推論的過程在他的論述中常常比結論來得更加重要，因為前面是他要推論的前提，反傳統式的推論是他的實踐，而辯證的結果並不會帶來明確的結論。我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回到前面的段落去找尋其論述的脈絡，才不會在後面的論述中被自己對某些字的既定概念所誤導。

Sigrid Weigel 在討論班雅明的「意象思考」時，亦提到班雅明繁複的句構亦是非常棘手的翻譯難題之一。但在英文的翻譯中，班雅明原本在德文中的特殊造詞模式 (*Wortschöpfung*)，因為「讀者」需要明確、流暢的文字需求，在英文翻譯中卻經常被類比的策略 (*assimilation*) 所取代，其結果便是，標誌著班雅明的特殊思考方式的複雜性與隱晦性也因此被忽略而消失，這成為當前翻譯嚴重的問題 (Weigel, 2008, pp. 213-215)。反觀〈譯者〉，班雅明其實早已點出這樣的問題，他藉著 Pannwitz 對歌德《西東詩集》的註解來說明：「我們的翻譯，即使是最好的，也是從一個錯誤的前提出發，他們想把印度文、希臘文、英文德文化，而不是把德文印度化、希臘化、英文化。……譯者最基本的錯誤是，緊緊抓住自己語言偶然形成的東西，而不讓自己的語言受到外語帶來的巨大衝擊。特別是翻譯來自遙遠的文字，必須鑽進語言最深的部分，甚至字、形、音融合為一的地方。他必須藉著外語來擴展和深化自己的語言。我們無

法想像這種改變的極限，無法知道每一種語言可以改變到何種程度，也不知道語言與語言之間的差異幾乎就好像方言之間的不同。不過，這要我們十分認真地看待語言，而不是對語言抱著輕率的態度。⁷」

以我們密切觀察的「傳達」一字為例，筆者希望藉由上述的觀點來重新檢視幾篇中英譯本有關「傳達」的重要段落，以觀察翻譯在面對班雅明這種獨有的寫作手法時所面臨到的具體問題。本文所採用以進行比較的文本取自下列四個版本：（一）胡功澤：〈譯者的天職〉，德譯中版本，直接置於德文引文之下，以便對照德文譯本；（二）Harry Zoh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德譯英版本（收錄於 *Illuminations*）；（三）張旭東譯：〈譯者的任務〉，英譯中版本（收錄於《西方翻譯理論精選》）；（四）蘇仲樂譯：〈譯者的職責〉，英譯中版本，（收錄於《寫作與救贖—本雅明文選》）。為節省篇幅，筆者於前文自譯的部分請自行參照前文，於此不再重複。

在前面提到，〈譯者〉文章開頭即對「傳達」一詞作定調討論的段落中，影響諸多中譯參考的宗恩英譯本以不同的詞“communicate”、“statement”取代之：

Was ‚sagt‘ denn eine Dichtung? Was **teilt** sie **mit**? Sehr wenig dem, der sie versteht. Ihr Wesentliches ist nicht **Mitteilung**, nicht Aussage.
(Benjamin, 1991a, p. 9)

（一）一個文學作品到底「說」些什麼？它要**告知**我們什麼？對於懂得文學的人來說，都是很少的。文學作品的本質，不在**傳達內容**，不在於說出來的東西。（胡功澤，2009，頁217）

（二）For what does a literary work “say”? What does it

⁷ 本文中譯引自胡功澤譯〈譯者天職〉，見胡功澤（2009，頁241-242）。

communicate? It “tells” very little to those who understand it. Its essential quality is not **statement** or the imparting of information. (Benjamin, 1968, trans. by Zohn, p. 69)

(三) 一部文學作品到底「說」了什麼？它在同我們**交流**什麼？對於那些領會了作品的人，它幾乎什麼也沒「告訴」他們。文學作品的特性不是**陳述事實**或發佈訊息。（張旭東，2000，頁 199）

(四) 文學作品“說”了什麼？這麼說又意欲**傳達**什麼？對於那些心領神會的讀者而言，他實際上幾乎一無所「言」。文學作品的根本特質並不在於**彼此意見的溝通**或者知識的傳遞。（蘇仲樂，2009，頁 57）

從文章的開頭，我們便可以看出 1968 年所出版於英文版《啟迪》中 Harry Zohn 英譯本的影響力。“communicate”一詞成為 *mitteilen* 的對應詞彙，而英譯中的解讀便成為「彼此溝通」或「交流」。前文所提出的「思考意象」儘管充斥於班雅明的所有行文之中，以動詞附加字首、字尾、或以名詞化等各種方式明顯地存在，但在上述的兩個英文翻譯版本中，原文中重複出現的傳達一詞已被各種不同的字彙所取代。「思考意象」在文章的開頭已不存在。相較於英譯，胡功澤的德譯中則已經特別在註解中說明這個字的重要性，因此，在中譯時已經列入考慮。但如同筆者於前面嘗試自譯的部分，中文為顧及語句的可理解性，即便字詞以類似，甚或是完全同樣的字詞譯之，終究無法完整呈現出混雜於字裡行間的同一字根，及其化身於不同詞性之中所欲並列的多重語意。在第一次出現「傳達」一詞的段落中，宗恩的版本已將該詞用溝通 (communicate) 與陳述 (statement) 取代，在接下去的段落中，「傳達」在此處英譯為 “transmit”。此處 transmit 或許更接近傳達的概念，但因為

“transmit”若接續上文，終究只能往上連結到英文“communicate”的溝通意涵：

Dennoch könnte diejenige Übersetzung, welche **vermitteln** will, nichts **vermitteln** als die **Mitteilung**- also **Unwesentliches**. Das ist denn auch ein Erkennungszeichen der schlechten Übersetzungen. Was aber außer der **Mitteilung** in einer Dichtung steht- und auch der schlechte Übersetzer gibt zu, daß es das **Wesentliche** ist- gilt es nicht allgemein als das Unfaßbare, Geheimnisvolle, ‘Dichterische’? (Benjamin, 1991a, p. 9)

(一) 可是，想要**轉介**的翻譯，只能**轉介訊息**，也就是說，那是作品裡不重要的東西。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這是一種次等的翻譯。在作品裡面，**訊息**之外的東西——即使次等的譯者也不得不承認，才是作品裡**重要**的部分——不就是一般認為無法捉摸、神秘莫測、「詩意」的東西嗎？（胡功澤，2009，頁 217）

(二) However, a translation that seeks to **transmit** something can **transmit** nothing other than a **message**— that is, something inessential. And this is also the hallmark of bad translations. But what then is there in a poem—and even bad translators concede this to be essential—besides a **message**? Isn’t it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o be the incomprehensible, the secret, the “poetic”? (Benjamin, 1968, trans. by Zohn, pp. 69-70)

(三) 然而任何執行傳播功能的翻譯所**傳播**的只能是**信息**，也就是說，它傳播的只是**非本質**的東西。這是拙劣譯文的特徵。但是人們普遍認為文學作品的**實質**是**信息**之外的東

西。就連拙劣的譯者也承認，文學作品的**精髓**是某種深不可測的、神秘的、「詩意的」東西；（張旭東，2000，頁199）

- （四）因此，任何想要發揮**信息傳遞**功能的翻譯除了**意見的溝通**之外，並未起到任何的**知識傳遞**功能—因而也無關宏旨。而這也正是所有拙劣翻譯的通病。但是，在文學作品當中，那些**意見的溝通**功能所不能及之處，正是那深奧和“詩意”的所在，這不就是我們思考的一個普遍的問題嗎？甚至就連拙劣的譯者都會承認這不能及之處正是作品的**精華**。（蘇仲樂，2009，頁57）

在同段敘述之中，我們雖然在英譯中看到“information transmission”或“message transmission”，與德文中談及的「訊息傳遞」涵義相仿，然而前面定調的句式已經由“communicate”所取代，班雅明藉「傳達」一詞，於各篇文本所不斷強調的理念與表現形式之間斷裂的關係，屬於形上學範疇的論述邏輯已被較屬於「人的層面」的雙向「溝通」一詞所取代。我們已看不見這個詞與其他文本中強烈的互文關係。也因此，我們在英進中的版本開始看到不同的解讀。除了字彙的特殊指涉與獨特用法必須注意之外，班雅明的反詰式問句所要展示其逐步推進的邏輯性更是班雅明行文的重點之一。在上列英文譯本段落中雖然可以看到句式邏輯的維持，但或許是因為英文的翻譯並沒有展示出字的重複而以不同的詞彙取代，流暢感代替了原文阻斷的效果，無法展示出班雅明「不斷重新呼吸式的、思辨式的描述」，導致中文的譯本容易忽略這其中所可能產生的辯證邏輯。如英譯“any translation which intends to perform a transmitting function cannot transmit anything but information”雖然如同德文刻意隱晦地提到，想要傳遞訊息的翻譯能傳遞的也只能是訊息，而訊息畢竟是不重要的部分，在中譯文便逐漸被解讀為「任何想要發揮信息

傳遞功能的翻譯除了意見的溝通之外，並未起到任何的知識傳遞功能」具有判斷好壞的結論型語氣。

班雅明在這段文章中提到，除了訊息之外，總還有些難以表達的、詩意的地方，而這些難以表達之處即試圖用來與只求訊息傳遞的觀念對立，但是班雅明並未排除訊息傳遞仍是其中的一部分，英譯雖然有“in addition to information”，但至於該句之尾，未如德文置於句子的前面。中譯部分，如（三）「但是人們普遍認為文學作品的實質是信息之外的東西」以及（四）「那些意見的溝通功能所不能及之處，正是那深奧和”詩意”的所在，這不就是我們思考的一個普遍的問題嗎？」卻適巧均忽略了「除了……還有……」這樣的刻意非排除式的句型，而直接成為孰好孰不好的二分法邏輯。

猶如筆者一再強調的，班雅明的論述邏輯，從破題的開頭便佔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而之後的論述，亦隨時扣住這樣的邏輯。除了用字之外，演繹式的哲學思考語言亦相當重要。讓我們再來觀察班雅明在論述完一般翻譯理論之後對所謂傳達一詞重新定義的這個段落。在一般的翻譯觀中就自由與忠實，就語意再現以及客觀傳達等各種面向予以質疑與推翻之後，班雅明融合其自有一貫的語言哲學觀點，將傳達 (*mitteilen*) 賦予更原初且直接的意涵。翻譯不再只是相互間的相似，而是要透過外來語言的刺激，激發本國語言去尋找那無法表達的部分。因此，下引這一段話可說是班雅明推論的高潮。在這個段落中，就傳達一詞，本質重要之處不在於對原文 (*Original*) 的語意的傳達 (*Wiedergabe des Sinnes*) 而在對語言和諧的互補，因此，班雅明於此處刻意使用了希臘文，猶如在〈論語言〉中將「字」直指聖經中上帝賦予亞當命名的權利，直接將傳達的功能賦予神學與形上學意涵：

Eben darum muß sie von der Absicht, etwas mitzuteilen, vom Sinn in sehr hohem Maße absehen und das Original ist ihr in diesem nur insofern wesentlich, als es der Mühe und Ordnung des Mitzuteilenden

den Übersetzer und sein Werk schon enthoben hat. Auch im Bereiche der Übersetzung gilt: *Ἐν ἀρχῇ ἦν ὁ Λόγος*, im Anfang war das Wort. Dagegen kann, ja muß dem Sinn gegenüber ihre Sprache sich gehen lassen, um nicht dessen *intentio* als Wiedergabe, sondern als Harmonie, als Ergänzung zur Sprache, in der diese sich mitteilt, ihre eigene Art der *intentio* ertönen zu lassen. (Benjamin, 1991a, p. 18)

(一) 正因為如此，翻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不必顧慮傳達訊息，傳達語意；而從語意的角度來說，原文對於翻譯的意義則僅僅在於，它為譯者以及翻譯省去了整理及表達語意的功夫。若望福音的「太初有言」這句話，在翻譯的領域裡也是有效的。因此，面對文意，翻譯的語言，不但可以，而且必須走自己的路，不要將表達原文語意的意向用模仿的方式，而要當作對翻譯語言和諧的補充，翻譯語言要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該意向。(胡功澤，2009，頁 238)

(二) For this reason translation must in large measure refrain from wanting to communicate something, from rendering the sense, and in this the original is important to it only insofar as it has already relieved the translator and his translation of the effort of assembling and expressing what is to be conveyed. In the realm of translation, too, the words *Ἐν ἀρχῇ ἦν ὁ Λόγος*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pply. On the other hand, as regards the **meaning**, the language of a translation can – in fact, must – let itself go, so that it gives voice to the *intentio* of the original not as reproduction but as harmony, as a supplement to the language in which it **expresses** itself, as its own kind of *intentio*. (Benjamin, 1968, trans. by Zohn, pp. 78-79)

(三) 為了這個目的，譯作必須大力克制那種要**傳達信息、遞送意義**的願望。原作之所以重要，正因為它業已免去了譯作和譯者組織和**表達內容**的工作。「太初有道」這句話同樣適用於翻譯領域。另一方面，翻譯的語言能夠—事實上是必須—**使自己從意義裡擺脫出來**，從而**再現原作的意圖** (intentio)。這一切不是複製，而是譯作自身的意圖。它和諧地補足了原作的語言。(張旭東，2000，頁 207)

(四) 正是基於這一原因，翻譯必須在很大程度上規避其**傳遞功能、避免轉述意義**的願望，對於翻譯而言，原作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業已解除了譯者及其譯作拼合和表達原作意義之苦。“太初有言”同樣適用於翻譯領域。另一方面，譯作的語言能夠，實際上也必須從**意義的表達中擺脫出來**，這樣他對**原作表意的表達**就不是複製而是融合，是對這種具有自我表達能力語言的補充，是其自身意圖的表述。(蘇仲樂，2009，頁 66)

在英文翻譯中，雖然宗恩在這段大致上維持了原文的意涵“translation must in large measure refrain from wanting to communicate something, from rendering the sense”，但在非常細微之處，即德文的 *von etw. absehen* (不去考慮某事) 變成了“refrain from”，使得這句話的隱晦性，又再度被決定性的結論語氣所取代。再者，傳達 (*mitteilen*) 以及語意再現 (*Sinnwiedergabe*) 這兩個非常關鍵的詞彙所形成的思想意象一再被其他同義或類似的詞彙所取代。而至段落的最重要部分，翻譯必須讓其語言走自己的路，使其不必以「語意的再現」為其意向，而是以讓語言和諧，以讓語言互補為其目標，讓語言「傳達其自身」 (*sich mitteilt*)，在英文的翻譯中卻忽略了不必以「語意的再現」為其意象，而直接譯為“the intentio of the original not as reproduction”，語意再現成為複製，而傳達

一字成為“expresses itself”。*Sinn* 與 *Bedeutung* 的差異並不存在，時而是語意 (sense)，時而是意義 (meaning)。因此，中文的解讀成為「使自己從意義裡擺脫出來」，「語意的再現」成為「複製」，而表達自己也變得不再有哲學上「語言在自身中表達其自身」的指涉，成為「譯作自身的意圖」。

伍、〈譯者〉的英譯對中文解讀與翻譯的影響

從前文對班雅明在用字上的觀察，我們的確看到如阿多諾與 Sigrid Weigel 所提到的意象思考，而就「傳達」一詞的英譯與中譯觀察，我們也發現到如 Sigrid Weigel 所提到的許多難以避免的被忽略的現象。字的特殊性與推論的特殊性在「考慮讀者」的「行文應流暢」的自然推論之下，又或者純粹因為無法做多面向的研究與對照而被忽略，使得許多的解讀指向班雅明是反意義與反溝通的。

保羅·德曼 (Paul de Man) 在 “Conclusions: On 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中雖然對 Harry Zohn 的譯本多有批評之處，但他並未將演講的重點著重在解讀，因此，德曼並未明確指出批評之處的段落與其他解讀的可能，而是以其解構的概念作自由的詮釋。其中，德曼提到了班雅明特殊的用語 (trope) 具有使傳統的象徵與意義錯位的力道。然而，他卻同時引述了上文中由宗恩所英譯的段落，未明確指出班雅明所謂的特殊用語體現在何處。他較著重的是班雅明的比喻，如陶罐、碎片等，他引述的英文卻也是宗恩在 1968 的譯文：“For this reason translation must in large measure refrain from wanting to communicate…” (De Man, 1986, p. 89)，致使這篇文章的中譯版本仍將之譯為「譯文必須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交流的需要」（陳永國譯，2004，頁 93）。原文「翻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不必顧慮傳達訊息，傳達語意」，透過評論、翻譯等多重的旅行，變成了「必須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交流的需要」。也因此，德曼提到 “The translator has to give up in relation to the task of refinding

what was there in the original” (De Man, 1986, p. 80) 時，我們不能確定德曼是否將 “refinding what was there in the original” 指涉為班雅明批判的「語意再現」(*Sinnwiedergabe*) 的層面，或者因為採用英文閱讀的同時將之解讀為原文意義不再重要，但這篇評論的中文已將之譯為「翻譯者必須放棄重新找到原文意思的任務」。在翻譯的旅行之中，一個字詞雖然在每句話之中因為無法顧及的多義性，使得字詞在上下文的脈絡中會產生些微的位移，其導致的結果是，班雅明論證邏輯，在翻譯的旅行中經常被片段的結論式語句所取代。

同樣地，我們可以回過頭來看德希達對班雅明的評論。德希達以「債務的歸還」(*donné à rendre, given to render*) 來詮釋班雅明使用的「任務／使命」(*Aufgabe*)，並認為該文的核心在於「一種系譜場面上的無力償還的債務」(*dette insolvable à l'intérieur d'une scène généalogique*) (Derrida, 1985b, p. 220)。⁸ 然而這樣的債權結構並非承襲自待翻譯的原文。德希達在此亦指出班雅明試圖讓翻譯超越現有語言界線的意圖，在試圖為〈譯者〉提出很簡短的重點整理之前，他亦同時提到：「有問題的是普通的翻譯概念，它暗含著這個歸還過程，其任務最終還是恢復最初所給予的東西」，而這個待歸還(*à rendre; wiedergeben*)者，或可說是意涵(*le sens*) (Derrida, 1985b, p. 221)。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德希達要提出來的，便是上述討論「語意再現」(*Wiedergabe des Sinnes*) 的問題。德希達將之翻譯為 “*restitution du sens*”。由於德文的 *Sinn* 與 *Bedeutung* 的差別並未見於德希達的文中，法文中對於德文 “*Sinn*” 與 “*Bedeutung*” 均以 “*sens*” 呈現，致使英文翻譯亦以 “*resitituion of meaning*” 而非以 “*sense*” 表示，因此，德希達 “*Des Tours de Babel*” 的中文翻譯便將之譯為「恢復所給予的意義」。「語意再現」的問題變成「意義歸還」的問題 (Derrida, 1985b, p. 220)。

因此，雖然德希達提醒我們班雅明對普通翻譯概念的質疑，即翻

⁸ 本文引用有關德希達 “*Des Tours de Babel*” 一文的中文翻譯引自郭軍所譯〈巴別塔〉。該文收錄於郭軍、曹雷雨編《論瓦爾特·本雅明現代性、寓言和語言的種子》。英文版則引自 Joseph F. Graham 所譯 “*Des Tours de Babel*”。收錄於 Derrida, J.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該書附錄亦附上德希達的法文原文。本文所引的頁碼以該法文原本為主。

譯的債權結構並非承襲自待翻譯的原文。依此前提，德希達做了如下的整理：一、翻譯者的任務並非從接受的角度規定 (*La tâche du traducteur ne s'annonce pas depuis une réception*)。二、翻譯的本質不在「交流」 (*La traduction n'a pas pour destination essentielle de communiquer*) (筆者按：即「傳達」 *mitteilen*)。三、翻譯與原文的關係不是再現的 (*il ne saurait être représentatif ou reproductif*) (筆者按：即「語意再現」 *Sinnwiedergabe*) 這三點，德希達稱之為班雅明的「警告」 (*précaution*)：不是接受、不是交流、也不是再現 (*ni reception, ni communication, ni représentation*) (Derrida, 1985b, pp. 223-225)。值得注意的是，德希達這個重點整理的前提所強調的仍是班雅明對普通翻譯概念的質疑，而非班雅明的主張。德希達在接續的段落中亦提到：「班雅明向接受論提出挑戰時，並不是要全面否定接受的相關性，而且無疑地為文學的接受理論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上述三項重點雖強調譯者的任務不在接受、不在傳遞訊息、不在尋求與原文的相似，但此論述並非對接受理論的全盤的否定，其欲揭示與辯證的，是人們緊抱著自有語言與認知的侷限性，因此，其強調的仍是一種超越，而非全盤的否定，並不是要全盤否定「讀者的接受」，而是要強調回歸為追求的源頭：

When Benjamin changes the viewpoint of reception, it is not to deny it all pertinence, ... But he wants first to return to the authority of what he still calls “the original.” (Derrida, 1985a, trans. by Graham, p. 181)

然而，德希達採用的〈譯者〉之法譯本裡面，雖然時時有德文附於括弧中提醒，但德希達其實並未凸顯出班雅明特殊的用字手法。在文章的開頭，即我們前文提到含有班雅明試圖顛覆與重現的「傳達」 (*Mitteilung*) 一字，德希達僅以 “communication” 或 “énonciation” 代之，並引述法文版 “*Ce qu'elle a d'essentiel n'est pas communication, n'est pas énonciation*” (Derrida, 1985b, p. 225)。之後並未再特別著墨於語言應該傳達其自身的部分，因此，班雅明想藉傳達一詞突顯其對當代語言觀念的批判，認為語言是

一種用來「告知」、「提供訊息」的工具的批判性意涵，仍逐漸因為“*communication*”一詞在論述之始的地位，漸漸為「不重溝通」的意涵取代。再加以德曼因為對譯者的任務有「失敗」「否定」的解讀，因此，他認為純語言擺脫了「意義的負擔」，是「完全擺脫了意義幻覺的一種語言純形式。」：

All these activities – critical philosophy, literary theory, history – resemble each other in the fact that they do not resemble that from which they derive. But they are all intralinguistic: they relate to what in the original belongs to language, and not to meaning as an extralinguistic correlate susceptible of paraphrase and imitation. (De Man, 1986, p. 84)

在德曼的解讀中，純語言所擺脫的，是被視為是語言之外的，易因仿作或模仿而變形的語義 (meaning as an extralinguistic correlate susceptible of paraphrase and imitation)，這樣的解讀仍相應於班雅明在〈譯者〉中批判當代翻譯觀將能指與所指視為分開兩方的觀點，但在中文翻譯裡，德曼的觀點成為一種普遍對意義的否定：「與意義無關，意義是語言外的對應物，易於被複述和模仿」（陳永國，2004，頁 97-98）。

從德希達與德曼對班雅明的評論之中，我們發現到，兩者均意識到班雅明所指的「語意再現」(*Sinnwiedergabe*) 是待質疑的、與原文間僵化的關係，然而，其討論中因並未特別強調班雅明於論述邏輯中所強調的待超越的脈絡，且翻譯中亦未著重其特殊的用字，而各自以“*sens*”與“*meaning*”直接取代，時而並代之以個人解構式的解讀而未強調班雅明的論述邏輯，其結果常常導致片段的解讀，致使班雅明一直強調翻譯不要僅在乎對原文的「語意再現」這一脈絡一再地在中文語境下被再譯與解釋為「放棄原文的意義」。再加上德曼認為班雅明對於接受理論持非常否定的看法“since he is so negative about the notion of reception anyway” (De Man, 1986, p. 80)（雖然德希達並不如此認為），德希達所整理的三

個班雅明對於當前翻譯理論的盲點：太拘泥於對原文的觀眾的理解、對訊息的傳達、以及對原文語意的再現而忽略了語言本身創造的無限可能。經過德希達的簡化，部分論述省略引述原文、也因為班雅明特殊用字原已使每個字詞在不同層次下即有不同論述脈絡與指涉，即使引述原文，亦難透過翻譯讓人看到完整的辯證邏輯，評論引述難免的斷章取義以及讀者需要快速消化的閱讀結果，德希達稱之為班雅明的「警告」(*précaution*)：即翻譯最本質與最重要的不是讀者的接受程度、不是對原文的訊息傳達、也不是對原文的語意再現，或許在法文 *ni reception, ni communication, ni représentation* (Derrida, 1985b, pp. 223-225) 的語境下尚有釋義的空間，但在中文的翻譯下，德希達的簡短整理便成了認為班雅明「不重讀者、不重溝通、不重原文意義」的佐證。

陸、結語

藉著 Sigrid Weigel 所提出的「意象思考」，即班雅明所獨有且刻意為之的寫作手法，意在將語言並列 (*sprachliche Konstellation*)，藉此使語言因與既有概念與隱喻產生張力並使思考靜默的一種哲學辯證形式，我們發現到，這種手法是班雅明尋求為其語言哲學找到一種論述形式所作的實踐。這種書寫的目的，是為了讓在所有語言表達之下仍被隱藏的意義獲得自由 (to free the hidden meaning concealed behind all linguistic utterance) (Smith, 1989, p. xii)。班雅明不僅在〈譯者〉一文，甚至在各式的文章之中，不論是以邏輯論述方式為主的早期學術性文章，抑或是後來拼貼式的雜文之中，無不思考著形式及其文學批評之間的關係。因此，創造一種特殊的文體來表達其想要掙脫傳統束縛的語言哲學思想似乎是班雅明的文字之所以具有魔力的主要來源。「翻譯是一種形式。將翻譯視為如此去理解，也適用在對原文的理解上。」〈譯者〉中提到的這句話正表明了班雅明語言理論中對於人類的表達作為一種形式的著墨與探討。也因此，班雅明的書寫讓我們意識到，作者的書寫形式，或者說是其寫作

風格，應該是翻譯中必須要認真嚴肅看待的問題，因為它代表的即是作者最深層的意圖，即如何將感受與感知化為語言文字的最本質與最初始的問題。

從 *Mitteilung* 一詞來檢視班雅明的〈譯者〉，我們更發現到，班雅明論述的思想脈絡與字詞間特有的互文性是幫助理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而在其中，猶如外國字般的使用每一個字詞，從本質、從意象上拆解每個字詞、並再度讓該字詞回復其原初的功能，是班雅明複雜的論述之中的重要方法。透過班雅明「意象思考」手法的追蹤，並透過相關文章的對照閱讀，我們可以發現到班雅明的思想脈絡猶如一個有機體，其各文章之間濃密的互文性更可透過「字」所創造出來的「思想意象」彼此關聯、彼此詮解。Sigrid Weigel 提到英譯忽略這種思想意象所產生的問題，點出了一般翻譯以通順流暢為前提，乃至刻意或無意地忽略文體風格，將對班雅明的辯證思想產生如何的流失現象。同樣的問題亦發生在中文講求流暢的翻譯策略之下，而藉著具體問題的探討，筆者亦希望藉此提醒，文體在翻譯中所應扮演但卻經常被忽略的重要功能。

當然，我們亦不能抹煞《啟迪》以小品文方式，而非以厚重的學術全集的方式，以較平易近人的出版方式將班雅明介紹入英語世界的貢獻。我們只能說，班雅明的書寫呈現了書寫的問題，而其翻譯理論的翻譯現象亦呈現了他所描繪的翻譯問題。面對一種創造性的文體、哲學性的對話脈絡、顛覆性的思想、邏輯性的推理、對外對內互文性極強而又自成一系統的詞彙、且猶如外國字般的煉字手法，翻譯成為極大的困難，必須要兼顧句式、文章脈絡與邏輯、字的互相指涉、以及班雅明經常不下結論的隱諱口吻，失去其一，其文中辯證邏輯性便猶如更難解的迷霧，甚至相互矛盾。

因此，以「意象思考」的分析手法，我們看到了「傳達」(*Mitteilung*) 一詞在班雅明〈譯者〉與其他相關論述脈絡中演變的過程，這樣的觀察猶如同時對班雅明〈譯者〉中的 *Wörtlichkeit* 這個詞所做的一個實驗。若以不假思索的方式將之對等於「直譯」或「硬譯」，從而認為班雅明的

主張是注重句法形式的對應，甚至以此簡化為「硬譯」，這樣的詮釋似乎落入班雅明在〈譯者〉中對一般翻譯概念的批判：「這樣跟隨原文句法的字對字的翻譯 (*Wörtlichkeit*)，使語意再現的可能成為泡影，甚至直接導致無可理解的危險」(Benjamin, 1991a, p. 17)。若以傳達 (*Mitteilung*) 一詞的意象思考手法來觀察，班雅明在討論傳達一詞的當代現象後，透過神哲式的推理，將該詞置放在更高的層次，給予傳達一詞更多超越意涵的手法同樣體現在 *Wörtlichkeit* 一詞在文中的位置。因此，在批判語言工具化的脈絡之中，*Wörtlichkeit* 仍指一般翻譯理論在乎的對字詞的忠實，然在經過班雅明哲學的書寫形式洗禮過後，每個字猶如苦行般，必須找回其最初的含意。班雅明在〈譯者〉中說得清楚：「必須從更令人信服的脈絡來解釋」(Benjamin, 1991a, p. 18)。該詞代表的意涵不僅包含了對字詞的忠實，更包含了上帝賦予亞當命名的絕對權力，是創造性的神力 (*Magie*)，因此，*Wörtlichkeit* 一詞，在〈譯者〉的尾聲，當班雅明認為相對於原文語意對等的追求，「翻譯便能夠且必須讓其語言走自己的路，……讓語言傳達其自身，讓意向依其自身的方式表達出來」(Benjamin, 1991a, p. 18) 之時，*Wörtlichkeit* 即便仍舊可譯為「直譯」，也應該要用嶄新的、創造的、超越的、辯證的角度來予以解讀，為了讓「直譯」產生新義，本文採胡功澤的譯法，暫以「字譯」代之，以求盡量展現該字在原文之中即已「異化」的效果：

更甚者，忠實的意義是，透過**字譯** (*Wörtlichkeit*) 的追求隱含其中，讓追求語言補充的那份強大渴望能夠從作品中說出。真正的翻譯是透明的，它不會遮蔽原文 (*Original*)，不會擋住照亮原文的光，而是讓純語言的光，一如其強烈地透過自身的媒介 (*Medium*)，更滿溢地照在原文之上。這尤其惟在句法中翻譯時的**字譯**能夠做到，且正是**字譯**證明是字詞 (*Wort*)，而非句子，是翻譯者的原元素 (*Urelement*)。因為句子是原文語言前面的牆，**字譯** (*Wörtlichkeit*) 是拱廊。(Benjamin, 1991a, p. 20) (本段由筆者自譯，粗體、底線

與德文由筆者所加)

Wolfgang Bock (2009) 即提到，「班雅明的文字似乎喚起了每個批評家心中的幻境 (phantasmagoria)，猶如一種作者與其詮釋者之間的私密關係。」⁹ (p. 42) 透過解讀班雅明的特殊書寫實踐，再次閱讀上述這段文字，每個字的意涵：原文 (*Original*)、媒介 (*Medium*)、忠實、乃至透明，均有了新的意涵，猶如被注入了無窮的生命，亦如阿多諾所說，如放射狀般，不斷演繹與開展。然而，班雅明魔幻般的用字，讓我們即使以他的「意象思考」細讀了每個字，終究無法得到明確的答案。不過，透過他的文字所產生的神力 (*Magie*)，班雅明教會我們的是，對於文化，我們要隨時將之理解為變動中的現象，而我們所能追尋的不變原則，就是永遠的辯證與隨時保持開放的懷疑態度。

班雅明同樣在德希達與德曼的心中喚起了解構的魔境，其文字亦產生源源不絕的多義性。然而，筆者透過實例要呈現給讀者的是，德希達與德曼對於班雅明的解讀並非是任意的解讀，亦非是以解讀班雅明文章為重點的文章，而是將閱讀班雅明所獲取的元素作為闡述其各自哲學思想的養分。因此，在評論的過程中，所引述的段落顯得有些片段，但兩者並未忽略掉班雅明試圖超越語言束縛的基本哲學思考。然因引述時為求淺顯而使用英法譯本的關係，原評論中亦無法強調出班雅明論述脈絡。經過多重再譯的影響，班雅明用來賦予哲學功能的「字」似乎又回到了各自翻譯語言的牢籠，被套上了各自語言既有的主觀印象，在「通順」的行文中變得無法「不斷重新呼吸」。

面對現有翻譯行為，我們看到了班雅明以突破傳統的思想模式的書寫對翻譯所造成的困難，然而，即使面對種種的不可譯，可譯性仍存在他的文本之中，隨著時間的累積，透過不斷的補充與註解，創造與突破，譯者終究不斷嘗試在所有尚未說出的部分，在想要「追求語言補充的那

⁹ 英文原文為：“The structure of Benjamin’s texts seems to call up phantasmagorias in the mind of each critic, like a kind of private relation between the author and his interpreters.”

份強大渴望」下做出各種努力。每一份努力都是譯者在猶如天職的驅使下所做的嘔心瀝血之作，都是值得保留與相互補充的。而這些，都有賴譯者更多的創造與補充，讓這些努力最後都得以互補，使之或許能夠在碎片中形成「更大的碎片」。

既然語言的最後本質，也就是純語言本身，在語言裡都束縛在語言的文字裡面，以及其轉變之中，那麼，它總是在文字裡面被附加了沈重和陌生的語意。解開這些附著的語意，把象徵者變成被象徵者本身，在語言轉變的過程中塑造並找回純語言，唯獨翻譯具有這種強大能力。（胡功澤，2009，頁 240）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朱劉華（譯）（2009）。**一個友誼的故事**（原作者：G. Schole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97）
- 李士勛（譯）（2000）。班雅明的《單行道》（原作者：T. W. Adorno）。載於李士勛、徐小青（譯），**班雅明作品選：單行道·柏林童年**（頁114-126）。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胡功澤（2009）。班雅明《譯者天職》中文譯文比較研究。**編譯論叢**，2（1），189-248。
- 郭軍（譯）（2004）。巴別塔（原作者：J. Derrida）。載於郭軍、曹雷雨（主編），**論瓦爾特·本雅明現代性、寓言和語言的種子**（頁43-82）。中國：吉林人民出版社。
- 陳永國（譯）（2004）。結論：瓦特·本雅明的〈譯者的任務〉（原作者：W. Benjamin）。載於郭軍、曹雷雨（主編），**論瓦爾特·本雅明現代性、寓言和語言的種子**（頁83-112）。中國：吉林人民出版社。
- 張旭東（譯）（2000）。譯者的任務（原作者：W. Benjamin）。載於陳德鴻、張南峰（主編），**西方翻譯理論精選**（頁199-224）。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蘇仲樂（譯）（2009）。譯者的職責（原作者：W. Benjamin）。載於李茂增、蘇仲樂（譯），**寫作與救贖——本雅明文選**（頁57-78）。上海：東方出版社。

英文文獻

- Benjamin, W. (1968).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H. Zohn, Trans.). In H. Arendt (Ed.),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pp. 69-82).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 World.

- Bock, W. (2009). Walter Benjamin's criticism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R. J. Goebel (Ed.), *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Walter Benjamin* (pp. 23-45). Rochester, NY: Camden House.
- De Man, P. (1986). Conclusions: On 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n P. de Man (Ed.),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pp. 73-105).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errida, J. (1985a). Des Tours de Babel (J. Graham, Trans.). In J. Graham (Ed.),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pp. 165-207).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errida, J. (1985b). Appendix: Des Tours de Babel. In J. Graham (Ed.),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pp. 209-24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inkelde, D. (2009). The presence of the Baroque: Benjamin's 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eils in contemporary contexts. In R. J. Goebel (Ed.), *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Walter Benjamin* (pp. 46-69). Rochester, NY: Camden House.
- Moses, S. (1989). Walter Benjamin and Franz Rosenzweig (D. Johnsen, Trans.). In G. Smith (Ed.), *Benjamin: Philosophy, history, aesthetics* (pp. 228-246).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iranjana, T. (1992).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mith, G. (1989). Thinking through Benjamin: An introductory essay. In G. Smith (Ed.), *Benjamin: Philosophy, history, aesthetics* (pp. vii-xlii).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eber, S. (2008). Benjamin's abilities: Mediality and concept formation in Benjamin's early writings. In D. Weidner & S. Wiegel (Eds.), *Benjamin Studien1* (pp. 75-90). München, Germany: Wilhelm Fink Verlag.

德文文獻

- Adorno, T. W. (2005). Charakteristik Walter Benjamins. In R. Tiedemann (Ed.),

- Walter Benjamin: Sprache und Geschichte: Philosophische essays* (pp.155-171). Stuttgart, Germany: Reclam.
- Arendt, H. (2006). Walter Benjamin. In D. Schöttker & E. Wizisla (Eds.), *Arendt und Benjamin* (pp. 45-98). Frankfurt, Germany: Suhrkamp.
- Benjamin, W. (1991a).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In T. Rexroth (Ed.), *Gesammelte Schriften IV.I* (pp. 7-64). Frankfurt, Germany: Suhrkamp.
- Benjamin, W. (1991b). Über Sprache überhaupt und über die Sprache des Menschen. In R. Tiedemann & H. Schweppenhäuser (Eds.), *Gesammelte Schriften II* (pp. 140-157). Frankfurt, Germany: Suhrkamp.
- Benjamin, W. (1991c). 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 In R. Tiedemann & H. Schweppenhäuser (Eds.), *Gesammelte Schriften I* (pp. 203-430). Frankfurt, Germany: Suhrkamp.
- Benjamin, W. (1991d). Denkbilder. In T. Rexroth (Ed.), *Gesammelte Schriften IV* (pp. 305-438). Frankfurt, Germany: Suhrkamp.
- Benjamin, W. (1991e). Einbahnstraße. In T. Rexroth (Ed.), *Gesammelte Schriften IV* (pp. 83-148). Frankfurt, Germany: Suhrkamp.
- Benjamin, W. (1991f). Notiz über ein Gespräch mit Ballasz. In R. Tiedemann & H. Schweppenhäuser (Eds.), *Gesammelte Schriften VI* (p. 418). Frankfurt, Germany: Suhrkamp.
- Menninghaus, W. (1995). *Walter Benjamins Theorie der Sprachmagie*. Frankfurt, Germany: Suhrkamp.
- Rexroth, T. (1991). Anmerkungen des Herausgebers. In T. Rexroth (Ed.), *Gesammelte Schriften IV.I* (pp. 881-887). Frankfurt, Germany: Suhrkamp.
- Schöttker, D., & Wizisla, W. (2006). Hannah Arendt und Walter Benjamin. Konstellationen, Debatten, Vermittlungen. In D. Schöttker & E. Wizisla (Eds.), *Arendt und Benjamin* (pp. 11-44). Frankfurt, Germany: Suhrkamp.
- Tiedemann, R. (1999). Anmerkungen des Herausgebers. In R. Tiedemann & H. Schweppenhäuser (Eds.), *Gesammelte Schriften Supplement I* (pp. 429-457).

Frankfurt, Germany: Suhrkamp.

Weigel, S. (2008). *Walter Benjamin: Die Kreatur, das Heilige, die Bilder*. Frankfurt, Germany: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